

外研社学术文库·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s

社会、历史背景下的 跨文化交际

[第四版]

Judith N. Martin
Thomas K. Nakayama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McGraw
Hill Education

外研社学术文库·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s

社会、历史背景下的 跨文化交际

[第四版]

Judith N. Martin

Thomas K. Nakayama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麦格劳-希尔公司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2008-3146

Judith N. Martin, Thomas K. Nakayama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S, FOURTH EDITION

ISBN: 978-0-07-313527-4

Copyright © 2007, 2004, b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revious editions © 2000, 1997, by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English Abridgement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Copyright © 2009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 division of the Singapore Branch of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 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 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 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英文影印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销售。

版权© 2009 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所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 第4版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s, Fourth Edition: 英文/(美)马丁(Martin, J. N.), (美)中山(Nakayama, T. K.)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8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ISBN 978-7-5600-8529-6

I. 社… II. ①马… ②中… III. 文化交流—研究—英文
IV. G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2792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杨书旗

封面设计: 牛茜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32.25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5290001

导读

◎ 贾玉新 宋 莉

一、关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

21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伴随经济一体化而来的是文化的多元化。这种经济一体、文化多元，或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不同文化之间应尊重差异，努力发掘不同文化资源，究其源流，择善而从；做到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互动，达到不同文化间的“和而不同”的和平相处，共存共荣的融合。费孝通先生非常精辟地把当今文化并存和互动的时代比喻为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时代(2002)。

21世纪是不同文化共存和互动的时代，跨文化交流空前频繁，深入发展，成为人们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必须，是地球村每一个居民在生活中回避不了的现实。不同文化间能否有效进行交往、对话，不仅影响我们能否完成某项跨文化交际任务和开展具体的交往，还会直接决定我们能否相互容纳，求同存异，共存共荣，和平相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不仅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课题，而且已经把此领域研究推向了一个与实现全球和平共处直接相关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

近二三十年来，跨文化交际研究在国内外都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本学科在理论上的成熟和突破(Gudykunst, W. B., 2005; 贾玉新, 2007)。正是理论上的巨大进步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指出了方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实际上，20和21世纪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跨文化交际的著名理论学家 William B. Gudykunst 在其重要著作《跨文化交际之理论》(*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005)中把现存的有关理论概括为17种之多,可见此领域研究的繁荣与昌盛。尽管学者们研究的视角不同,对文化和交际的界定各异,但他们的研究无论在研究理论框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等方面,都颇有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之妙。概括地讲,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理论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 1) 在研究中,把文化和交际相融合,并把文化当作理论变量,用其对跨文化交际进行描绘、解释和预测。
- 2) 跨文化交际研究一般分为两个层面:文化层面(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t cultural level)研究和个体层面(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t individual level)研究。前者是指文化之间的交际,后者是指人际间(群体和个人之间)的交际。文化层面的研究通常以Geert Hofstede 提出的集体主义-个体主义这对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作为不同文化对比的参照系,进行跨文化研究。而个体层面的研究则克服了这种黑白相分的整齐划一的做法,把个体元素(自我建构、个人价值观和人格)作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对交际产生影响的媒介,从而研究人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据笔者观察,迄今为止,多数学者的研究都囊括了这两个层面,但是在个体层面的深入研究,尤其理论研究,近年则刚刚起步。尽管如此,全球范围内跨文化交际研究方兴未艾,在我国也已开始,并已取得可喜进步。
- 3) 文化层面和个体层面对文化影响的因素在理论上都可用来对跨文化交际进行预测,但产生的效果是有所区别的。在文化层面上的预测结果与文化规范和规则(cultural norms and rules)相关。换言之,在预测某一行为的时候,把有关行为与其文化规范或规则相联系,即该行为与文化规范和规则是因果关系。比如,有的学者认为群体主义取向的文化对圈内的人(in-group members)大多采用平等(equality)的分配规范。而个体主义取向的文化则无论对圈内或圈外的人都倾向采用公平(equity)的分配规范。在交际规范方面,中国文化中的“客气”和“含蓄”规范,显然与中国式的间接交际风格相关,而西方的“真实”或“不强加于人”规范则与其直接交际风格相关。但是,不

同文化在规范上的差异，显然是不同文化层面上的价值观的差异所造成的。

二、关于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法

目前跨文化交际研究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局外人或旁观者的身份对不同文化间交际所存在的共性或差异性的研究，这种方法叫做客位研究 (etic approach)；另一种是以某一具体文化为中心，是圈内人对自身文化的交际的研究，叫做主位研究 (emic approach)。两个术语渊源于 K. Pike 的音系学和语音学的研究。etic是指不同文化所共有的发音，而emic则是指某一文化所特有的音位 (phoneme)。J. Berry (1980) 曾对这两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etic approach 是局外人的客观研究，而emic approach则是圈内人对自己的文化或自己的群体文化的主观研究。etic通常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的对比研究，而且采用的标准被认为具有绝对性或普世性。这种方法常以现实主义、实证主义、决定主义等形式出现。而emic则立足于本体文化，很少涉及其他文化，常以经验主义、相对主义和反实证主义等形式出现。etic主要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而emic则常进行定性研究或近来被哲学界称之为“体证”性的研究方法。

W. B. Gudykunst 认为，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而单独采用etic 或emic途径也有很大问题，理性的做法是对二者取长补短，科学地融合。关键是内容决定方法，即被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决定研究方法，而不是相反。

在跨文化研究中，研究者经常有意无意地把不同文化中的概念相互等同，在翻译时仅注重语言而忽略哲学和文化内涵的传递，这会产生把自己文化中的哲学和文化概念强加于其他文化的趋向，这种跨文化概念迁移现象被学者称之为“强加客位” (imposed etic)，其后果自然是对一方文化的哲学思想的曲解。比如，在把儒家的哲学概念译成英文时，我们必须兼顾它们的哲学和文化内涵，即语言翻译与哲学和文化内涵传递并重。而有些中国传统的哲学概念几乎是不可直译的，我们必须寻求一种适合的办法。实际上“强加客位”的做法是十分普遍的，但其后果往往难以估量。从古至今，东西方的相互误解，尤其西

方对东方文化的理解失误恐怕与这种“强加客位”不无关系。

在探讨跨文化交际中的共性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较为理想的做法是emic与etic相结合，把在emic基础上所收集到的文化特有概念在从不同文化所收集的数据中加以验证，总结出不同文化的共性概念。这包括对有关概念仔细推敲并反复翻译，对各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初始数据收集，以及在此基础上，比较参详，发现不同文化共享的概念。这是由etic研究方法衍生而成的研究方法，被称之为衍生客位(derived etic)。实际上，这种方法也是用emic方法来检验etic方法的一种做法，即用主位检验客位的一种方法。

三、本书作者的贡献

本书作者以批评的态度审视目前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众多方法，在综合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辩证法(dialectic approach)。这一视角博采众长，使辩证方法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体系。

首先，作者对各家理论进行客观审视、梳理、分析、对比和批判，指出各家之长及其局限性。在此基础上，综合各家所长，构建了辩证法理论。

1) 综合较为普遍流行的三种研究方法

在把交际与文化相融合的研究中，无论是文化层面还是个人层面上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们都把文化作为一种理论变量对交际或进行描绘、解释，或进行预测。学者们由于受各自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影响，对跨文化交际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但总体上采用三种具体的研究方法：(1)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或功能主义法(social science/functionalist approach)；(2) 解释法(interpretive approach)；(3) 批判主义方法(critical approach)。三种方法各异，反映出学者们对文化、文化与交际的关系、人类行为以及知识论或认识论、本体论等基本问题在观点上的差异。然而，每一种方法对我们对文化、交际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理解都有独特的贡献。同时，它们也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本书作者对以上三种方法进行较客观的对比分析：

	社科/功能法	解释法	批判法
学科基础	(社会) 心理学	人类/社会语言学	综合不同的方法
研究目标	描绘/预测行为	描绘行为	行为的动态变化
现实观	外在/客观, 可以描绘	主观存在	主观/物质世界
人类行为观念	可以预测	创造/任意性	动态及可变性
研究方法	纵览/观察	实地考察/现场观察	媒体语篇分析
交际与文化关系	文化影响 交际	交际创造 和传承文化	文化是权势斗争之 战场/交际差异直接 与权势差异相关
主要贡献	指出交际之多方面 差异, 但对环境因素考 虑不够	强调交际与文化以及 文化差异研究应与环 境密切结合	强调文化和交际中要充 分考虑政治和经济因 素, 权势关系是所有跨 文化交际研究中的关键 因素

本书作者对以上三种方法进行了分析, 在指出它们的优点的同时, 也指出了它们的局限性。社会学(科学)方法是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 代表人物是知名学者G. Hofstede, W. B. Gudykunst, Ting-Toomey, Young Yun Kim等。这一方法突出群体(group-related)文化的研究, 尤其注重不同文化群体间的文化差异研究; 在对影响交际的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因素的对比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跨文化交际的可预测性, 为此学科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然而, 本书作者认为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创造性往往多于可预测性, 就像我们不能对所有的交际进行准确的预测一样, 我们不可能确认所有的影响交际的内在和外在因素。如何认识和发展交际创造性能力就迫在眉睫。另外, 由于研究者往往远离他们所研究的目标文化和文化群体, 他们缺乏对目标文化的敏感性, 也缺乏对目标文化和群体的理解, 其结果是, 研究者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不同文化的文化/语言概念等值对待(conceptual equivalence), 并进行跨文化概念迁移, 造成强加客位。

解释法流行于80年代末, 代表人物是Clifford Geertz (1973)等。这一方法是基于民族际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的研究。其最大的特点是由于它突出交际与环境(历史、宗教、民族、权势等)的关系, 因此强调研

究应把交际置身于环境之中。比如在宗教背景下了解非洲裔美国人，在脱口秀(talk show)环境中研究美国流行的交际风格。作者认为脱离环境的一般的问卷形式等不足以了解交际的特点。然而，解释法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1)在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者中，真正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在交往时会发生什么情形的学者为数不多；(2)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者常常是局外人，他们很难准确地展示所研究的文化群体的交际模式。

批判主义方法的代表人物有Richard Delgado (2002)、Linda Putnam 和Michael Pacanowsky (1983) 等学者。批判主义方法与社会学和解释法的视角不同，它的最大特点是把文化看作是多样化和动态多变的，而且，文化之间很难有固定的界限。这一点显然区别于社会学和解释法。批判法主要侧重于权势和交际的研究，特别重视在社会和历史的大环境中研究交际的来龙去脉。这也意味着这种方法忽视了特定情景中的面对面交流(face-to-face interaction)的研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实用性。

2) 作者的视角：辩证法理论框架

在客观地审视和综合以上三种方法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辩证的方法。辩证法对以上三种方法进行客观的审视，扬长避短，择善而从，并且吸收了其他各家的真知灼见，有机组合成为一个独立的综合性的辩证法框架(dialectical framework)。

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辩证法凸显交际的过程(processual)、重视交际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relational)、强调对传统的一切二分或黑白截然相分的传统哲学思想的超越，同时又突出既辩证又统一的理念。辩证法重视过程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它强调交际中的文化适应和认同，以及交际模式不是整齐划一和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多变的过程的理念。这种方法重视关系，表现在它提倡要以综合性思想来对待影响交际的各种变量，一定要改变把它们当作各自孤立的存在思维定势。比如，在研究某一现象时应把价值观、信仰、历史等因素综合对待。从哲学的角度看，辩证统一的思想是作者对西方一切二分的传统哲学思想的挑战。作者认为交际是十分复杂的过程，应把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和现象统筹考虑，克服简单的文化群体之间黑白相分或截然对立的研究方法。

实际上，作者所采用的是东方，尤其中国文化的思维传统，是以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思想为基础。而这种辩证统一主要体现在：文化与个体、个人与环

境、差异与相似、静态与动态、过去/历史/现在和将来、社会受利者与社会非受利者等方面的既统一又辩证的关系。作者认为所谓辩证法在某种意义上讲,不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种理论,而是一个观察跨文化交际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或问题的透视镜。

3) 本书研究特点

作者把三种研究方法有机组合的辩证法视角首先继承并突出了解释法的环境因素,即交际必须与环境相结合,突出环境对交际的影响。但是,作者尤其强调在社会、政治、历史、宗教等大环境中对交际加以研究,这一点与解释法,比如,社会语言学方法所突出的重点是有区别的。后者似乎更突出社会情境因素对交际的影响。

其次,作者非常重视权势与交际的关系,并突出权势是如何影响交际研究的。作者认为,绝对平等的交际几乎不存在,这种历史造成的交际双方的不平等现象影响我们如何给对方以及自己定位,而且直接影响交际。交际中的交往双方地位“永远不平等”的观点,是本书两位作者的独特见解。

再之,多数跨文化交际研究是在国际层面上的研究,即对不同国家或民族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而本书作者则把重点放在美国国内不同亚文化或不同共存文化(co-cultures)之间的交际方面,这对我们了解和认识美国不同群体文化的交际大有助益。

在批判继承各家思想的基础上,作者集三种方法之大成,提出辩证的研究框架,有其独到之处,使其在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独树一帜。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其长,也有其短,面对跨文化交际的严重挑战和极为复杂的交际现实,恐怕不存在什么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我们所能提供的答案与所面临的问题相比,可谓杯水车薪,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多元文化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冲突和合作屡见不鲜。不仅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文化与交际的关系也是异常复杂多变。在这个意义上讲,跨文化交际研究是永无止境的。

各章导读

第一部分 跨文化交际学基础。 这部分包括四章，主要追溯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该领域研究的不同视角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综述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理论方法提出了独特的辩证法思想，这一思想是全书的精髓所在。

第一章：为什么研究跨文化交际。 作者从科技、人口、经济、和平、自我意识、伦理等七个方面，以鲜活和丰富的事例说明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者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大量应用，使不同群体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同时也引发了现代通讯技术使用者对文化身份和权利的思考。而世界人口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国内与国际范围的人口流动也加速了区域性民族、种族、社会阶层、宗教和语言等的多元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面临由多元化所带来的种种冲突的挑战。这一多元化的挑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而变得更加严峻，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抢占更多的阵地、寻求理解和发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以历史 and 发展的眼光审视了殖民主义和全球经济多极化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指出在多元化与一体化、挑战与发展并存的形势之下，跨文化理解对于化解由种族、民族和宗教差异而导致的冲突的重要性。作者强调为使地球村的居民实现和平共处，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和种族，以及不同的语言、社会经济地位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必须首先实现相互间的理解和认同。而对其他文化和群体的发现之旅也往往是我们对于自身的了解和对于自我身份的认识的过程。换言之，跨文化交际是自我觉醒和自我意识提高的重要途径，而自我觉醒和自我意识的提高则是跨文化交际的结果。作者在本章最后讨论了跨文化交际中的伦理问题。指出了极端普世论和相对论的局限性，主张在跨文化交际中应该秉承对话原则 (dialogical approach)，即在协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权衡正确的行为准则时，要注重通过对话寻求符合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交际行为和策略。对于学习跨文化交际的学生而言，伦理问题体现在其任务不仅是要学习自我反思、了解他人，还应该在获得跨文化交际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建立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责任感与能力；唯如此，方能成为有伦理修养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者和实践者。

第二章：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历史。 本章追溯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史，

并在综合以往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法研究框架。作者首先介绍了跨文化交际研究早期人类学家E. T. Hall的研究, 尤其其他的非言语交际行为理论对不同文化模式的揭示和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等。作者指出, 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初期对于国际背景中发生的实际问题的关注和早期学者研究背景的多学科性决定了现今跨文化交际研究实用主义和跨学科的特点。随后作者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范式概括为三大学派: 社会学派、解释学派和批判学派, 三种理论方法的区别渊源于研究者对于人类行为、文化和交际理解的不同和其研究目的与具体方法的不同。社会科学法又叫做功能法, 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 是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 主张人类行为是可以预知的, 其研究目的是描述和预测行为, 特别是预测文化对交际行为的影响, 通常以定量研究为主要方法。代表性研究有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Min-Sun Kim的会话约束理论和C. Gallois等人的交际顺应理论。作者指出, 该理论方法有利于发现影响交际过程的心理和社会变量, 但又受制于所能发现变量的有限性, 而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文化意识也会影响研究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后期, 出现了解释法, 就是D. Hymes (1974) 提出的民族交际学的理论方法。这一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主观的而非预先设定的, 因而也是不可预测的。文化的创造和维系是通过人类的行为交际而实现的, 研究者的目的就是理解和描述交际行为如何发生并创造和维系交际者的所属文化, 而非依据某些文化模式和变量对交际行为作出预测。此类研究多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 研究的侧重点是描述特定文化环境中的交际行为而非交际行为的跨文化对比。作者指出, 虽然这一理论方法对交际情境和文化背景的强调有助于深入研究某一特定文化群体的交际模式, 但是以往此类研究很少是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研究, 而且研究者对所观察的交际行为的描述与解释因其局外人的身份而往往不够准确全面。作者继而介绍了跨文化交际研究与解释法关联密切的另一重要理论方法: 批判法。此派学者同样强调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性和交际情境的研究, 但是他们更关注宏观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 如社会结构和权势、后殖民主义现象等对交际行为和过程的影响。其研究目的不仅仅是理解人类行为, 而且还通过研究的发现去改变人们的生活, 如抵抗权贵势力的影响。其研究方法以文本分析为主, 将对电视等多媒体文本的分析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手段。但是, 对大众媒体语篇文本分析的偏好使其常常忽略了面对面人际交流的研究, 从而削弱了其研究成果的实用价值。另外, 缺乏实证研究也使得批判法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停留于研

究者主观的论述。最后，作者提出跨文化交际研究应该在综合上述三种传统理论方法的基础上采用辩证的理论方法。这是作者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的重要贡献，也是贯穿于此书的中心思想和方法。辩证法跨文化交际研究强调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性、关联性和矛盾性。首先，作者认为任何行为模式、文化和个人都是发展变化的，应该以动态的眼光研究跨文化交际，不应该只关注交际的结果而忽略交际的过程。另外，作者还认为跨文化交际的各个方面都是互相联系的，应该以联系的和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眼光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问题。最后，作者指出跨文化交际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对立的辩证过程，例如差异与相同、静态与动态、历史（过去-现在）与未来、优势与劣势都并存于跨文化交际的各个阶段。因此，作者要求本书的读者坚持辩证的思维，并透过辩证的视角，以发展的、联系的和整体的眼光，多角度、多方面地审视跨文化交际的问题。这一思想是本书的精髓，是对传统跨文化交际理论局限性的突破，也是对跨文化交际过程认识的重要飞跃。了解这一辩证思想对本书的学习和跨文化交际研究意义重大。

第三章：文化、交际、环境/背景和权势。本章是对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文化、交际、环境/背景和权势四个核心概念的界定和论述，也是对作者倡导的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阐述。作者首先梳理了三个传统范式对文化和交际概念的解读及其对文化与交际关系的不同认识，进而指出辩证法理论承认传统理论方法关于文化的不同观点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作者认为文化既是群体共享的认知和信仰模式，也是不同意义争相较量的战场。辩证地看待和研究文化将有助于人们认识对立的文化理念，从而全方位地认识客观世界。对于交际作者采用了L. A. Samova、R. E. Porter 和 J. W. Carey等多数学者的看法，认为意义赋予了交际最本质的特性。但是作者似乎更强调交际的能动性，指出交际过程是动态的，意义的协商过程即是人们创造、维护、修复或者改变客观世界的过程。由此看来，作者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态度也应该是动态的和发展的。作者还详细介绍了人类学家F. Kluckhohn、F. Strodbeck和社会心理学家G. Hofstede的价值取向理论框架，说明辨别和研究交际的跨文化差异，并从辩证的角度指出其理论框架在揭示价值取向个体差异方面的局限性。作者的辩证思想还体现在对文化与交际关系的认识上。正如书中指出的，文化与交际互为影响：文化既直接作用于交际行为，又通过交际得以实现和加强；同时交际亦可以是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抗衡的手段。作者对影响跨文化交际的另外两个

要素，即环境和权势也作了简要的说明。交际发生的客观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物理场景和社会、历史及政治背景，交际者之间的权势关系和斗争始终伴随着交际，环境和权势都深刻影响着交际的过程和结果。环境与权势对交际的影响又因文化而异，这就加剧了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复杂性，也使得跨文化交际研究更加富于挑战性。作者在本章最后再次强调了辩证思维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意义，鼓励读者辩证地、多方位地思考制约交际的各项要素，在具体环境和背景中研究和探索跨文化交际。

第四章：历史与跨文化交际。本章重点论述了各种历史因素对跨文化交际实践与研究的重要作用，再次体现了两位作者对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独到见解。作者以独特的视角透视了历史的多面性，指出历史可以从多方面影响文化和文化身份的建构。历史按其性质和范围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政治历史、思想历史、社会历史、家庭历史、国家历史和文化群体历史；这些历史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造就了我们和我们的世界。对于我们自身历史和他人历史的无知将严重阻碍双方的跨文化交际。作者认为历史是通过叙事建构的，而对叙事文本的创建和解读则取决于权力的操纵者。换言之，权力的拥有者决定了历史如何描写和发展，也就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and 彼此间的权势关系。根据作者的观点，文化身份的建构与历史密不可分。而了解有别于显性的主流文化叙事的隐性历史，即基于性别、性取向、种族与民族、殖民和社会经济诸因素的历史，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现实是他人对历史的文化态度协商的产物。作者在此深入讨论了殖民史是如何影响当今政治经济结构并进而影响跨文化关系的。作者在本章中讨论的历史问题通常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被人们所忽视。作者还列举了促使“接触假设”（即不同文化的人只要相互接触就可达成理解和沟通）成立的八个基本条件，凸显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最后，作者重申了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辩证关系和协调这种对立统一对于在跨文化交际中理解自我及他人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 跨文化交际过程。包括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说明影响跨文化交际动态过程的身份、语言和非言语因素。

第五章：身份与跨文化交际。本章以美国社会中不同的阶层和人群为例，用辩证的观点阐述了身份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作者在本章的开篇明确指出了身份的重要性和交际与身份的关系：身份是交际与文化之间的桥梁；交际是身

份构建和表达的手段。根据传统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范式,学者们对于身份的理解各有不同。社会科学派的身份观是静态的,认为身份是个体对其所属不同群体的文化归属。解释学派的身份观是动态的,认为身份是在与人的社会交往中建构的。而批判学派的身份观更进一步,认为环境因素是身份形成的动因。而本书作者主张以辩证的观点认识身份,强调身份既是静止的也是变化的,既产生于人际间的交往中,也发生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作者指出身份是通过语言符号传达的;表示身份的语言标签的变化映射着文化的变迁。身份的认同以文化而异,恰当的语言表达直接关系着跨文化交际中双方对彼此身份的界定是否得到认同,也关系着交际的成败。作者还指出人们普遍拥有多重身份,人们既分属于主流文化或非主流文化群体,同时也属于不同性别、年龄、宗教、民族、阶级、区域和国家等文化群体。作者详细列举了这些不同身份的特点和表现。人们的多重身份是同时并存的,这就意味着他人对我们的认识以及我们对他人的认识也应该是多方面的。对于跨文化交际而言,辩证的身份观就是要认识到交际者同时具有多重身份,而且这些身份彼此联系,其共同作用的结果构成了交际者的身份。作者随后指出由于个人和社会环境的原因,各种身份特征经常是形成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的基础。而随着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两种或多种文化边缘,他们具有多重文化身份,并经常处于不同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的抉择中。作者最后进一步阐明了身份与交际的关系以及辩证的身份观对跨文化交际的积极意义。身份问题是目前跨文化交际研究关注的热点之一,而本章内容充分体现和诠释了作者在前面几章提出的辩证思想和历史观,为研究跨文化交际中复杂多变的文化身份提供了理论框架和科学方法。

第六章:语言与跨文化交际。本章综合了社会科学派、解释学派和批判学派对语言的研究,包括语言的跨文化变异、语言与权势、语言与身份、语言与全球化、双语和多语问题、跨文化翻译和语言政治与政策等。作者首先讨论了静态的语言系统与动态的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指出对语言符号意义的解读必须与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相结合。同时语言符号的使用或意义的解读依赖于经济、历史、政治和宗教等其他符号系统。作者随后说明了语言与感知的关系,介绍了三种不同的立场和最近的相关研究发现对Sapir-Whorf假说的挑战。作者接着详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交际风格(如强语境和弱语境、直接和间接、明确和含蓄等)和特定情境中的交际风格的选择,进一步说明了意义

的建构离不开具体的文化环境和情境；作者以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间的交际为例，强调权势关系对交际行为和交际方略会产生重大影响。作者详细讨论了跨文化交际与双语和多语的关系，指出人们通过语码转换应对不同交际情境和文化环境。作者还把笔译和口译看作跨文化的交际，并指出译者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如何妥善处理文化非对等程度的问题。两种语言的差异实质上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其文化意义的解读应是文化协商的结果，因为意义的对等是建立在限定意义的文化对等之上，如何处理文化的非对等是翻译成败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文化交际研究是翻译研究的助推器。作者在本章还论及身份、语言政治、语言政策等方面。在讨论英语国际化时指出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国际社会或地区原有的语言格局，其突出的变化就是英语作为国际语所产生的英语与民族身份的协调问题。本章反映出作者对跨文化交际中语言问题的辩证思考和后殖民主义的语言观。

第七章：非言语语码与文化空间。本章集中讨论了非言语语码与跨文化交际的关系，其内容延续着前一章“人际-环境”、“静态-动态”的辩证思路。作者以非言语语码与言语语码的对比为基础，说明了非言语语码的概念、特征和范畴，并结合新近的研究发现分析了非言语语码的普世性和相对性，指出非言语交际普遍存在但更多时候是隐性的、不被人们觉察的，非言语行为传递人们对彼此的感觉和交际者之间的社会及权势关系。作者认为非言语语码同言语语码一样都是符号系统，其所指代的意义总是受到符号运用的具体社会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本章的贡献突出地体现在两位作者提出的文化空间的概念及后现代文化空间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文化空间指的是身份和意义建构所依赖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是建构意义的交际活动之组合；它不仅仅包括家庭、周边环境、地区和国家这些物理场所，也包括这些场所中所创造的文化意义。文化空间因此可以是实体的场所，也可以是隐喻的社会场所。作者借用“社会地图”一词说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角色营造了影响人际交往或意义协商的文化空间。作者强调理解文化空间与文化、权势、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辩证的思维。作者指出文化空间是变化的，旅行和流动是改变文化空间的两大方式，而文化空间格局的变化将带来意义和身份建构的变化。后现代文化空间是本章的另一重要概念，也是作者辩证的和动态的研究思想的又一体现。后现代文化空间指的是由诸如被使用的语言、扮演的身份、以及相关的仪式等文化实践所限定的动态多变场所或空间。作者以网络空间或虚拟空间为例，说明了后

现代文化空间同物理空间一样充盈着文化意义，同时简要介绍了相关的研究发现。在作者的眼中，现代文化空间的特点是它的流动性和易变性，它只存在于建构意义和身份的需要和过程中。文化空间和后现代文化空间也是不同文化相互协商和抗衡的空间。本章的辩证思想、符号学的视角、对新研究发现的介绍，特别是对文化空间和后现代文化空间的论述都为读者学习和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言语交际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

第三部分 跨文化交际的实践。这部分包括四章，其目的是要帮助学生将前面两部分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具体的跨文化交际之中。

第八章：大众/通俗文化与跨文化交际。本章重点是说明大众/通俗文化和民间文化对于建构、维系和体验文化，特别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相对，指的是为大多数人所共享和熟知的，包括电视、音乐、录像和流行杂志在内的体制或物质。但它又有别于传统的和非主流的民间文化，是文化产业的产物，并因其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对大众行为乃至其所生活其中的文化产生影响。作者引用了近年发生在美国的抵制大众文化和英语语言的垄断以及国际上大众传媒的事例，说明人们与通俗文化的关系协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通俗文化媒介对意义的建构、受众对通俗文化意义的解读经常受到社会、历史和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作者指出文化文本同文化空间一样，受众在对通俗文化产物的消费中或者接受或者抵制，不断地协商他们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文化群体通常是依照流行的文化定型而被大众文化塑造或表现的。通俗文化或大众媒体也是再现文化群体的手段，是我们了解其他文化的渠道。主流文化群体和非主流文化群体，比如移民和少数族裔之间的相互了解（或者误解）和沟通往往是通过通俗文化媒介达成的。人类社会中的权势关系也无不例外地融入到这些大众文化产物中，各媒体所用语言的选择就足以说明权力抗衡与通俗文化的密切关系。作者在本章最后讨论了通俗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帝国主义现象及相关研究。作者的结论是通俗文化对于解读全球社会林林总总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对于理解其他文化和民族的社会力量和动态变化、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与实践都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第九章：文化、交际和跨文化关系。本章全面地探究了跨文化交际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包括殖民历史和当今社会制度对来自不同性别、年龄、身体条件、种族、民族、信仰、阶层、地区和国家的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同事关系、友